

从“全球符号学”到“灾难符号学”

张汉良

生物学与文学研究长久以来便有密切的关系，学术界流行的许多文化理论泰半具有生物学基础，却很少被人提到。举例来说，透过正文化作用，物群生物学发展出殖民论述，而环境生物学则发展出生态诗学。人跟环境的互动，就像文学与环境的互动。我们可以从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

我曾经把文学研究的生物论述分成两类，第一类属于生态政治学的文学研究，它和大多数以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近似，发展出教条和阅读策略，以政治姿态和伦理介入的方式，探讨文学或文化文本——无论是当代的或古代的。第二类属于生态科学的文学研究，以生态系统为基础，具有相对的科学实证性和系统性。¹甚么是“生态系统”(ecosystem)?《牛津大辞典》提供的第一个例句是：“生物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的互动所建构的关系系统”(1935年)。1963年的一个例句表达得更为清楚：“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基本单元，由动、植物和它们所影响的环境构成。”²这些说法一直沿用到今天。我手边使用的生物学课本中有一句话：“海洋是地球上最大，最少被探索的生态系统”³。这本流行的教科书给生态系统所下的两个定义和《牛津大辞典》大体相同：(1)“某地区所有的生物总体和非生物的互动”；(2)“某生物社群以及其物理环境”。这些例子无非都在说明一个事实：我们必须以“系统互动”的概念来思考生态现象。举例来说，自然灾害研究属于环境生物学或生态科学很重要的课题，其中与人互动的是非生物的自然因素，由此出发，推广到其他层次。

近年来我做了三个个案研究，它们处理生态系统，而不是皮相的生态批评。

¹ 张汉良，〈再论比较文学史上的“恒常危机”〉，陈惇、王向远主编，《比较文学教研论丛》，第一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页37。

² 《牛津大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89年网路2版。

³ 尼尔·A·康贝尔等人合着，《生物学：概念与连接》，第4版，旧金山：皮尔森，班捷明·康敏思出版社，2003年，页678(Neil A. Campbell, et al. eds. *Biology: Concepts and Connections*. 4th ed. San Francisco: Pearson, Benjamin Cummings, 2003)。

第一个个案是生物学和文学中的寄生现象；第二个是自然灾害；第三个探讨先秦诸子文献中的生物符号学概念，都已经为国际核心刊物验收。⁴ 本文是根据第二项个案研究发展出来的。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从今天在内地走红的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开始谈。巴斯奈特于200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⁵，被翻译为中文后，也陆续引起许多讨论。文中举了一个新的比较文学实例。2005年11月学者聚集在里斯本，讨论1755年万圣节的里斯本大地震这个自然灾害对欧洲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她认为这一类研究是当前比较文学家可以关注的课题。说来也是巧合，2004年12月26日东南亚和南亚遭逢到前所未有的，由苏门答腊地震引起的海啸袭击，死亡人数达到25万人。2005年6月，也就是里斯本会议之前，我在芬兰的符号学夏令营发表了一篇文章：〈灾难符号学——另类“全球符号学”？〉，文中也谈到里斯本地震的文化含义。这篇文章的命题是：从地球科学和社会科学出发的灾难研究已经成为显学，然而符号学尚未就此着力。我根据符号学的开山祖美国哲学家普尔斯(1839-1914)和18世纪苏格兰经验哲学家汤玛斯·瑞德(1710-1796)的符号理论，并参考目前从事灾难研究的社会学家的论点，演绎出一套人以及其他生物和自然灾害互动的模式。这个实例研究和巴斯奈特所举的里斯本地震论述，以及后来国内的川震论述，同样见证到一项事实：全球性的灾难现象对于文学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可能有的启发；以及比较文学家如何因应外在世界的变动，而调整研究方向。这种生态科学的文学研究诚然是全球化的产物，也反映出人类地球性的关怀。

2005年6月11-19日，芬兰符号学夏令营依往例在义马特拉举行，第二组研讨会主题为“全球性符号学”。“全球性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这个名词出

⁴ 张汉良，〈寄生符号学刍议〉，《符号系统研究》，31卷2期，2003年，页421-439 (Han-liang Chang, "Notes towards a Semiotics of Parasitism", *Sign Systems Studies* 31. 2 [2003]: 421-439); 张汉良，〈灾难符号学——另类全球(化)符号学?〉，《符号系统研究》，34卷1期，2006年，页215-223 (Han-liang Chang, "Disaster Semiotics: An Alternative 'Global Semiotics'?" *Sign Systems Studies* 34.1 [2006]: 215-223); 张汉良，〈自然与文化之间：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哲学的生物符号世界〉，《美国符号学期刊》，24卷1-3期，2008年，页159-170 (Han-liang Chang,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A Glimpse of the Biosemiotic World in Fourth Century BCE Chinese Philosoph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Special Issue on Biosemiotics] 24.1-3 [2008]: 159-170)。

⁵ 原刊于英国比较文学学会期刊《比较批评研究》3卷1-2期 (*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2006] 3.1-2: 3-11)，汉语译本刊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页1-9。我国学界的回响，请参见《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1、2期乐黛云等学者的笔谈。

自1994年汤玛斯·西比奥克(1920-2001)在国际符号学会柏克莱大会所发表的主题演讲。2001年西比奥克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全球性符号学》。⁶这个时髦的术语引起了一些弟子和从众的回响，包括当年与西比奥克合作，如今贵为《符号学》杂志主编的马赛尔·达奈西。⁷

让我们回到1994年的场景，西比奥克提出“全球性符号学”的时候，点出了两条文学史和现实政治的线索，文学史的例子源出于莎士比亚的两齣剧本，分别是《暴风雨》的大法师普洛斯佩罗和《哈姆雷特》的主人公哈姆雷特。普洛斯佩罗引导出一个双关语的游戏，“全球”同时指涉我们的“地球”以及泰晤士河南岸的《地球》剧场；哈姆雷特则指着自己的头颅，说它是一个失序的地球。因此莎翁藉这两位游戏人物之口，再一次地宣示了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主题，也就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认同关系，以及生与死的幻觉与现实的辩证过程。这些文学典故引发了西比奥克一连串的全球性同义词，包括：“all-encompassing”（“全部包容的”）、“comprehensive”（“包容性的”）、“international”（“国际性的”）、“limitless”（“无限制的”）、“pandemic”（“蔓延全球的”）、“unbounded”（“无边际的”）、“universal”（“普世的”）、“cosmic”（“宇宙性的”）。此外他列举了一些国名的清单，从A到Y，也就是从阿根廷(Argentina)到南斯拉夫(Yugoslavia)。美中不足的是，他漏掉了字母Z开头的津巴布韦(Zimbabwe)；更不幸的是，他无法预见到南斯拉夫的解体。因此以国家命名的“全球性符号学”恐怕要把南斯拉夫剔除，现实政治无异开了他一个玩笑！这位“泛符号学”推动大师——人们戏称他为“Sebiotics”（西比奥符学）——习惯性地游走于各学术领域之间；再从各学术领域超越到跨学科方法论的后设层次；最后提到他所钟爱的、刚刚诞生的“生物符号学”。如此这般，他玩弄了

⁶ 汤玛斯·西比奥克，《全球性符号学》，布鲁明腾：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2001年（Thomas A. Sebeok.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⁷ 马赛尔·达奈西主编，《全球性符号学发皇记》，多伦多：雷嘎斯出版社，2001年（Marcel Danesi, “Global Semiotics: Thomas A. Sebeok Fashions an Interconnected View of Semiosis”. In: Marcel Danesi (ed.), *The Invention of Global Semiotics*. Toronto: Legas, 2001. 27-50.）。

一个大的喻词游戏：“地球/生物/符号圈”，使得他的“全球性符号学”巡航画了一个完美的圆圈。

西比奥克提出的“全球性符号学”显然和上帝一样，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但是这难道不正和符号学的讲求分析性，与“由下往上的”逻辑系统性正好背道而驰吗？说来也是凑巧，“全球性符号学”提出来的时候，正是“全球化现象”成为文化研究热门课题的时候。如果符号学只不过能跟着“全球化”的屁股后面跑，那么“全球性符号学”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充其极它仅能在这个失序的世界地图上，从A到Z，增加一、两个国家。今天“global”（地球的、全球的）这个术语的语意已经超载与泛滥到一个惊人的程度，而失掉了共识，甚至根本就失掉了意义。如果我们把西比奥克上面所列出的同义词和左派社会学家，如安东尼·纪登斯对这个字眼的批判⁸，我们就会了解“全球化”的解释真是言人人殊，甚至根本是南辕北辙的。虽然如此，由于这个字眼儿被使用得过分泛滥，我们每天被“global warming”（全球性暖化）轰炸，好像全球战争（global warring）爆发了似的；我们每天在一个全球性的“e化地球村”（e-global village）漫游，仿佛它是一个虚拟的迪士尼乐园；今天我们甚至已经习惯一个陌生的字眼，叫做莫名其妙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⁹

谈到蔓延全球的“pandemic”（全球性传染病）这个字，倒使我想起2003年发表的《寄生现象的符号学》（参看前注4）。当时由于成见作祟，我没有去读西比奥克的全球性符号学论著，我写作的动机是由于在那之前港、台、大陆爆发了一场流行疾病叫做SARS(非典)。这篇文章在塔尔吐大学的《符号系统研究》31卷2期发表之后（见前注4），我才看到西比奥克的书。令我感到兴趣的是，这本书的封面是一个奇怪的图像：电脑合成的造物主伸出他的手，显然是在谐拟

⁸ 安东尼·纪登斯，《第三条路：社会民主政治的更新》，剑桥：政体出版社，1998年（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1998.）。

⁹ 埃力克·A·斯万吉道，《既非全球，亦非在地：全球在地化与幅度政治》，收录于：卡文·R·考克斯主编，《全球化的空间：重申在地的权力》，纽约：籍而富出版社，1997年，页137-166。（E. A. Swyngedouw, “Neither Global Nor Local: ‘Gloc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In Kevin R. Cox, (ed.) *Spaces of Globalization: Reasserting the Power of the Local*. New York: Guilford, 1997.137-166.）。

米开兰基罗壁画《创世纪》中的造物主，但祂伸手接触到的不是亚当，而是一个素描的寄生虫。这个封面插图隐含玄机：创世纪时上帝创造生命，当然也可以包括要命的寄生虫。

本文〈从“全球符号学”到“灾难符号学”〉讨论一个全球性事件的符号学涵义。这个全球性事件其实是一场灾难，它不仅影响到灾难发生的地点，也影响到没有发生的地点。什么是“灾难”？灾难如何被文字语言建码？如何被解码？为什么符号学家，包括喜欢高谈阔论“全球符号学”的学者，都不太关怀这个现象？¹⁰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地球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却对灾难研究却着力甚深？我认为符号学家，作为比较文学家，确实应该关注这个问题。符号学者艾科曾经指出：“任何一个自然事件都是一个符号。”¹¹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讨论自然灾难的符号学的出现？大家那么投入研究全球化现象，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全球灾难的符号学？我们难道应该（或者不应该）归咎于西比奥克的“全球性符号学”吗？

2004年耶诞节后的天灾，迫使我们思考自然和文化系统网络中的符号功能。大地震以及其所引发的海啸所构成的多元系统，是如此地错综复杂，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符号学分析。这个网络系统的正文化包含了多重的科学和民俗解释，各种符号形式的转换，以及动物和人类对符号行为的反应。此地所谓的人类又可以分为：国别的、种族的和社会阶层的；其中有一些群体，比如安达曼群岛的少数民族，一直到海啸发生之前还与世隔绝。关于这场自然灾害的书写报导，也可以

¹⁰ 一个例外是法国数学哲学家河内·栋姆 (René Thom, 1923-2002)，请参见其：《结构稳定性与型态发生学：模式理论纲要》，D. H. 昊乐英译，加州：阿迪森/韦斯里出版社，1972年（*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Morphogenesis: An Outline of a General Theory of Models*. (Fowler, D. H., trans.) Redwood City: Addison-Wesley, 1972）；及其《型态发生学的数理模式》，W.M. 布鲁克斯、D·冉德英译，英国，契切斯特：哀里思·何尔乌德出版社，1983年（*Mathematical Models of Morphogenesis*. [W. M. Brookes and D. Rand, trans.] Chichester: Ellis Horwood, 1983.）河内·栋姆从机率和拓扑学立论。另外就是本文后面会提到的布朗修，从诠释哲学和修辞的角度探索。参见莫希思·布朗修，《灾难书写》，安·司马克英译，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Maurice Blanchot, *The Writing of the Disaster*. [Ann Smock, tra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¹¹ 翁伯托·艾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4年，页15（Umberto Eco,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Macmillan, 1984, p. 15.）。艾科说：“自然事件的认知过程之所以会引发符号命题，正是由于推论作用。知觉总是质疑性的、条件性的，具有下注意味——只是我们不自觉而已。如果讯息充足，认知条件完备，我们便可作推论，比方说：“可能会起烟。”皮尔斯就曾指出知觉往往是一种假设性的证据，具有符号演义的潜能。”（页35）。

划分为科学的宏大叙述，精确的地球物理分析，和无数的小故事，如身历其境者透过不同叙述观点所做的陈述，中间有许多穿凿附会了宗教和迷信，形成语意层次的过度建码，比方说动物如何拯救了人命云云。观光事业、媒体、慈善机构救援机构、断瓦残垣、尸体——这一切交织成一个失序的、“全球性”规模的破碎拼图。

根据艾科对符号学史刍议的划分，这些有关灾难的文本都可以划分为百科全书式的符号学实践，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其中发展出严格定义的灾难符号学和宽松定义的符号学。¹²普尔斯曾经描述人在半睡眠状态中遭受外在猛烈力量的打击，譬如一道响亮拖长的汽笛声¹³，这一种外在力量（所谓“第二元”）对身体的撞击迫使得人要解释这个现象，比方说地震发生了。作这样的解释需要透过一个普尔斯所谓的解释机制，即第三元的“符解”，譬如像住在台湾的人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指示符号出现，如天花板上的吊灯是否在摇晃？桌上杯子里的水或厕所抽水马桶的水面是不是在剧烈波动？地震学家会告诉我们：苏门达腊西边的九级地震是一个指示符号，回溯指示两个板块的挤压，震后的海啸是另外一个指示符号，指示先前的地震。地震与海啸都可以透过电脑显像，因此这两个自然现象也成为了肖像符号。类似的说法属于地震学家的叙述，被我们用普尔斯符号学术语重新解释过。可是实际上的自然灾害，吞噬了25万条人命的结果，却未必是地球物理科学家关注的要务。对符号学家来说，自然和文化的符号研究包括动物对地震的认知和行为，以及洲际观光人口的流动。举例来说，南亚海啸的死者有许多来自北欧和西欧的观光客，他们为了寻找南方的阳光和沙滩，甚至其它乐趣，而命丧异域。关于跨国旅游现象的论述，难道不也同样地需要符号学家的解码与再建码吗？

¹²翁伯托·艾科，〈符号学史刍议〉，塔叟·巴尔贝主编，《符号学开展：国际符号学会第二届大会议程》，三卷，柏林：木栋出版社，1983年，卷1，页75-89（Umberto Eco, "Proposals for a History of Semiotics". In Tasso Barbé [ed.], *Semiotics Unfolding.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s*. 3 vols. Berlin: Mouton, 1983, Vol. 1: 75-89.）。

¹³查尔斯·山德斯·皮尔斯，《哲学主要论著选集》，弥敦·豪塞等人编辑，2卷，布鲁明腾：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98年，卷2，页4（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Nathan Houser, et al. (eds.). 2 vo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熟悉西比奥克著作的人都知道，他的符号演义历史从地球的史前史开始，但是这一部分“全球”历史只是狭义的地球物理意义的历史，是一个还没有被人类文化干扰的地球历史。虽然如此，即使这一个人类出现之前的世界，它的历史也是后来由人类的地球物理知识所建构的。这个地球物理意义的全球性和人文地理学者所理解的全球性是迥然不同的。任何一位符号学家都会同意：“全球性符号学”是人类活动的符号学。如果不是如此，西比奥克的“全球性符号学”怎么可能根据国家做划分呢？难道“国家”不是人文地理学和地理政治学的产物吗？

要处理“灾难符号学”这门特殊的学问，我们首先需要界定“灾难”。“灾难”的英文“disaster”以两个词素拼凑而成：“dis”这个字首和“aster”这个源出于希腊字的“星球”——即英文“star”的字源。前面的字首dis含有“负面的”、“分离的”意思，因此“disaster”是指一个偏离轨道的星球，或称晦星、霉星、噩星，皆无不可。晦星原来是指涉一种天象，引申出来泛指自然异象与灾难。当代法国哲学家莫希思·布朗修(1907-2003)说，如果désastre意味着离开(dés-)星球(astre)，如果它指的是从吉星高照的命运下坠，它意味着灾难必然性笼罩下的一个堕落(1986)。但是自然现象是否是属于灾难性的？它的规模大小如何？这一切必须透过它对人类和其他的生物的冲击来评估。一旦灾难这个概念产生，自然和文化的古老二分法就无法成立了，因为自然灾害永远涉及人本的价值观点。2003年出版的一本讨论自然灾害的社会科学论文集，编者马克·裴凌为自然灾害下了一个很扼要的定义，他说自然灾害是：“自然事件导致的人类灾害的缩写。”他进一步指出：“物理现象是自然事件产生的必然因素。”¹⁴但是自然事件如何能被翻译为危险和潜在性的灾害，却需要取决于人类对自然事件所面临的冲击，以及人类无法承担这种自然现象的冲击时的困境，这样才称为自然灾害。因此在没有生物之前，地球上的火山爆发、海啸不能称为自然灾害。从更

¹⁴ 马克·裴凌，主编，《自然灾害与全球化世界的发展》，伦敦：洛特基出版社，2003年，页4(Mark Pelling, ed. *Natural Disasters and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3)。

自私的观点来说，在没有人类之前，譬如说在侏罗纪，巨大的自然变动导致了恐龙的大灭绝，我们也很难把它划分到自然灾害的范围，因为它对不存在的人类不可能有影响。

我们不妨把自然灾害简略的勾画出一些范畴。“灾害学者”(risk researchers)把自然灾害根据传统地球科学的分类分成四大领域(圈 sphere)，包括：(1)大气层(atmosphere)，或更正确地说“气圈”；(2)水域(hydrosphere)，或称“水圈”；(3)岩层(lithosphere)，或称“岩圈”；(4)生物圈(biosphere)。这四个范畴都包含源出于希腊文的英文名词“sphere”，可以看出来它是以地球中心的概念出发的。覆盖在地球上的有水和岩石；笼罩在地球上的是大气；居住在地球上的是生物，包括动物和植物。因为地球是圆的，是一个“globe”，因此这四个范畴也是四个“圈”。20世纪初年，俄国的地质学家维纳斯基(1863-1945)在提出他有名的“生物圈”理论时，做了这四种划分。¹⁵他的划分影响到塔尔吐学派的符号学家洛特曼(1922-1993)，启发了后者的符号圈概念。¹⁶假如地球可以划分为上面的四个自然层次，那么自然灾害应该包括大气层的(气圈的)，比如说空气污染；水域的(水圈的)，譬如说海洋、河川污染；岩层的(岩圈的)，如土壤沙化或地震；生物圈，如森林大火。往往这些灾难是跨领域而来的，以海啸为例它结合了地质现象(就起源而论)和水文现象(就后果而论)¹⁷。既然洛特曼比照“生物圈”铸造了一个新词“semiosphere”(符号圈)，那为什么我不能铸造一个新名词：“灾难符号学”呢？热浪、寒流、台风、洪水、水灾、旱灾、地震、火山爆发、猪流感、寄生虫——这些自然灾害都和我们居住的地球画上同心圆，环环相扣。所幸的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出现太大的符号圈灾难，也就是符号学灾难——虽然无论中外，随便搬弄符号学名词、不明究理、言之无物的人越来越多。

¹⁵ 维纳斯基，《生物圈》，大卫·B·郎格谬尔英译，纽约：司普林格出版社，1997年(Vladimir I. Vernadsky, *The Biosphere*, trans. David B. Langmuir. New York: Springer Copernicus, 1997.)。

¹⁶ 尤理·M·洛特曼，《心智宇宙：符号学的文化理论》，安·舒克曼英译，伦敦：I·B·陶里斯出版社，2001年(Yuri M. Lotman, *Universe of the Mind: 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 Trans. Ann Shukman. London: I. B. Tauris, 2001)。

¹⁷ 孔德拉提耶夫等合编，《环境灾难：人为的及自然的》，柏林：司普林格出版社，2002年，页22(Kirill Ya Kondratyev,; Alexei A. Grigoryev,; Costas A. Varostos, (eds.).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Anthropogenic and Natural*. Berlin: Springer. 2002, p. 22.)。

难免让人感觉“符号学灾难”好像不久就会发生。在发生之前还是让我们谈谈“灾难符号学”吧！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1930-2004)曾经玩弄文字游戏，谐仿当年好莱坞导演柯波拉拍的电影片名《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这里面隐含了一层悖论，因为基督教启示录是未来发生的，而且是地球末日才会发生的。因此

“Apocalypse Now”不应该翻译做“现代启示录”而应该翻译为：“现在就是末日”。德里达写了一篇文章，被英译为：“No Apocalypse, Not Now”；〈没有末日，绝非现在〉(1984)¹⁸，因此德里达的论辩和前面所提到布朗休，有异曲同工之妙。末日是一种发生的可能性，我们一直希望它被推迟到永远，至少不是现在。但是可怕的《彗星撞地球》和《明日过后》这类现代神话，透过通俗影视文化所传达的恐惧，有相当迫切的即临感。生活在东亚岛弧地震带上的台湾居民，至少有一部份人，经常在担心：何时会发生一场超级大地震？假使8级以上的地震来的时候，台湾有什么建筑不会倒塌？

从符号学的观点而言，关于地震和其它天灾的种种描述，皆可上溯到古代符号思想中，自然符号的讨论。古希腊哲学典籍——尤其是斯多噶学派和伊匹鸠鲁学派的著作——区分了替代性的“符号”(*semeion*)和推论性的“朕兆(证据)”(*tekmerion*)，说明了一个道理：人们观察到的自然事件的显像，如地壳的滑动，可以被推论为一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如海啸¹⁹；或者代表神的讯息。²⁰古希腊有一种占卜方式，称为“大人之术”(*mantike technike*)，指涉分析、判断外在世界可感知的符号，如闪电或日蚀，与更宏观秩序的关系。²¹。古希腊文“*mantike*”这个字导源于有超凡能力的人(*mantis*)：卜者²²，类似《诗经》〈小

¹⁸ 夏格·德里达，〈没有末日，绝非现在：全速前进！飞弹七发七不中〉，《区分理论》，14卷2期，1984年，页20-31（Jacques Derrida, “No Apocalypse, Not Now [Full Speed Ahead, Seven Missiles, Seven Missives]”, *Diacritics* 14.2 [1984]: 20–31.）。

¹⁹ D. S. 克拉克，《符号学原理》，伦敦，洛特基，1987年，页12（Clarke, D. S. Jr. *Principles of Semio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p. 12.）。

²⁰ 乔凡尼·曼内提，《古典时期的符号理论》，克莉斯·丁理查森英译，布鲁明腾：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15（Giovanni Manetti, *Theories of the Sig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trans. Christine Richard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

²¹ 同上书，页19-20。

²² 同上书，页14。

雅)〈鸿雁之什: 斯干〉中占梦的“大人”, 因此我们不妨也戏称他为“大人”。

2004年海啸灾难后的许多叙述都掺杂着这一类的民间传说性质。举其大者有: 海神震怒的泛灵论信仰; 灾后普吉岛鬼魂出没; 动物的第六感救了它们的性命等等。²³ 如何面对并处理这些民间智慧, 是国际救援单位感到日渐棘手的问题。这些多半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小故事, 诚然属于艾科所谓的百科全书式的符号文本实践, 它们与同时出现的某些宏大叙述, 如“灾难灭绝论”并驾齐驱, 各擅胜场。²⁴ 一位今天走红的通俗灾难灭绝论论者, 安东尼·密尔内对事件的发生和事态的发展显然非常兴奋, 预估“印度洋上的灾难会使得学界再度注意到灾难灭绝论, 而成为国际学术会议的焦点。”²⁵ 事件发生后, 我试图透过网路购买一本畅销书《末日: 灾难事件科学》(2000), 竟然找不到任何一本折扣书, 存货都标价在100美元左右。洛阳纸贵, 可见一斑。没想到此公一语中的, 年底的里斯本会议竟然验证了他的看法; 巴斯奈特以及在下也难逃其神机妙算, 岂不可叹? 话说回来, 灾难理论和灾难灭绝论是两码事儿, 不可混为一谈。灾难灭绝论者趁火打劫, 也是人之常情。比较严肃的是, 这种论调无形之中进入人心, 反映在许多小叙述和媒体的耸人听闻中, 如安达曼群岛上的某些少数民族是否可能已被大海啸灭族云云。让我们回到符号学正题。

1903年4月16日, 普尔斯在哈佛大学的第四场讲座(手稿309号)谈到“第

²³ 2005年元月报刊有密集的报导与专论, 参见阿比·古德讷福, 〈泛灵论部族倾听海的声音, 因此逃过了一劫〉, 《纽约时报》及《国际前锋论坛报》, 2005年1月24日(Abby Goodnough, “Animists Listened to Sea, and Lived.” *New York Times an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4, 2005.); 约翰·伯奈特, 〈普吉岛上的鬼魂〉, 《国际前锋论坛报》, 2005年1月14日(John Burnett, “The Ghosts of Phuke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4, 2005.); H·D·S·格林威, 〈请不要救我们, 请勿打扰!〉, 《国际前锋论坛报》, 2005年1月19日(H. D. S. Greenway, “Please Don’t Rescue Us. Just Leave Us Alon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9, 2005.)。

²⁴ 路迪克讨论十九世纪两大地质学派论争, 综合论以达尔文(1809-1882)为代表; 灾难灭绝论以他的师尊莱偶(1797-1875)为代表。路迪克认为灾难灭绝论很难成立, 只不过是一种“论述方式”罢了。参见其〈达尔文与灾难灭绝〉, 贾宁纳·布西傲《了解灾难灭绝》,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2年, 页57-82 (Martin Rudwick, 1992. “Darwin and Catastrophism”, In Janine Bourriau (ed.), *Understanding Catastroph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7-82.). 有关这个课题在二十世纪地质学的后续发展, 请参看: 得瑞克·阿洁尔, 《新灾难灭绝论: 地质学史上重要的罕见事件》,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3年 (Derek Ager, *The New Catastrophism: The Importance of the Rare Event in Geologic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有关灾难和演化论的关系, 请参见前引布西傲《了解灾难灭绝》中克里司多福·兹曼的文章, 〈演化论与灾难灭绝论〉(Christopher Zeeman, “Evolution and Catastrophe Theory”, In Bourriau [ed.] 1992: 83-101).

²⁵ 安东尼·密尔内, 〈灾难灭绝论者早就料到了!〉, 《国际前锋论坛报》, 2005年1月20日 (Antony Milne, “The catastrophists Saw It Coming.”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0, 2005.).

三元”在自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从一块石头的坠落谈起，“我知道：如果我放手，这块石头就会下坠，因为经验告诉我这类物质总会如此。”普尔斯把自然现象和经验法则结合，而法则即构成了“符解”。前面提到的著名例子，人在睡眠中被惊醒，的确包含了一个三元结构，具有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但是我们难免怀疑在事件发生之初，那短暂的瞬间，符解是否存在？或即使存在，是否能发生作用？布朗修就曾经质疑灾难的“法则”性（见前引书）。符号学家大卫·克拉克认为法则作为符解有其限制，他特别请出了十八世纪的经验哲学家汤玛斯·瑞德（有趣的是，他是普尔斯的思想来源之一）来支持自己的论点。²⁶

二十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导致了知识论的断裂。如今再召唤出一位十八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未免令人有时代倒错之感。由于自然已经是被符号所建构的，根植在社会历史脉络里，自然/文化的二分法势必不能成立，符号命题与推理似乎也难以容纳一个透明的第一元。虽然如此，普尔斯以指示符号规模朕兆（证据）推论过程，可以被解释为以符号学中和了自然事件，仿佛自然事件可以不受语言的干扰似的。2004年底的海啸灾难传出一则令人称奇的报导。安达曼海岛的土著老人眼见浪来了，呼唤族人快跑，往高处避难。老人的呼唤诚然是“语言的”，由于情况的急迫，还可能包括手势等辅助语言的行为。此地的“符解”显然属于普尔斯指称的“习惯”，然而，习惯总是受到语言中介的，至少在传达讯息过程中，自然符号会被翻译为语言符号。

克拉克主张，在经验被传达之前，人们对自然异象的立即感知，可以是未受到语言干扰的，换言之，是先于语言的。克拉克不同意普尔斯的论断，他提出比自然符号在逻辑上更原始的“原符”。原符（或“生符”）是一种“短暂的”符号，它的产生并非为了传达作用，也不需要经过推理而被解释。²⁷“原符”先

²⁶ 汤玛斯·瑞德，《人类心智探索：论常识原理》，伦敦，T·卡德尔，1785年，布里斯托，汤玛斯古籍影印公司，1990年影印（Thomas Reid,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Sense*. [London: T. Cadell, 1785]. Reprint. Bristol: Thoemmes Antiquarian Books, Ltd., 1990); 《汤玛斯·瑞德作品集》，爱丁堡，麦克拉赫兰与司帝华出版社，1863年，布里斯托，汤玛斯古籍影印公司，1994年影印（*The Works of Thomas Reid*. 2 vols. [Edinburgh: Maclachlan and Steward, 1863.] Reprint.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4).

²⁷ 克拉克，《符号学原理》，页50。

于“传符”和“语符”，在逻辑和演化上属于更原始的符号。克拉克引述汤玛斯·瑞德对自然符号的分类，并指出：“吾人通常所谓的自然‘原因’应该更正确地被称为自然‘符号’（符表）；所谓‘后果’应该称为‘符指’。”²⁸此地所提到的符号应属于第一类自然符号，被符号指涉的事物是“靠自然建立的，但是要靠经验去发现。”²⁹。瑞德所举的例子有力学、天文学和光学方面的，它们“要靠自然建立关系，靠经验或观察去发现，其后果则需要透过推理而预测。”³⁰。我们不妨再加上地震学的例子，以求其论据（和我们挪用手续）的完备。

瑞德的定义可以权充自然灾害作为符号研究的出发点，本文前面所引述的普尔斯和艾科的说法，和他一脉相传。无论是地震，或是海啸，自然灾害包括至少三个阶段：（1）自然事件的发生；（2）人对事件的解释；（3）事件的后果与影响。我们必须同意：“自然”一词是条件性与权宜性的用法，而不必强作德里达式的语言追究。在古希腊，朕兆作为推论符号，或在普尔斯的指示符号中，因与果的关系可能相距很远；但是根据克拉克的说法，“一个原符的指涉场合，作为解释的内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和符号紧密衔接的。”³¹ 有一类原符“指自然环境中的一个突发事件，是‘指涉场合’中可被辨识的‘表意爆发’。”³² 克拉克是哲学教授，竟然也不能免俗，塑造了两个新词：“表意爆发”（*significate occurrence*）和“指涉场合”（*referent occasion*）。下面简单解释一下：“表意爆发”指“某一现成的表意符号所表示的发生中的事件”；该符号的“指涉场合（对象）”则意谓“某时空状况下，吾人对某爆发的事件是否具有意义的立时判断”。³³ 因为“原符”缺乏语言上的主词+述词结构，缺乏传播意图和诠释规则，这种符号普遍存在于低等动物界，甚至所有的生物界中。

但是我们凭什么判断某“原符”指示的是“表意爆发”而非“无意义爆发”，甚至其他种类的“表意爆发”？2004年底地震发生之后，《纽约时报》有一篇有

²⁸ 《汤玛斯·瑞德作品集》，卷1，页122。

²⁹ 同上书，卷1页121。

³⁰ 同上书，卷1页121。

³¹ 克拉克，《符号学原理》，页67。

³² 同上书，页64。

³³ 同上书，页61。

趣的科学专论³⁴，略谓：因为核爆和地震在电脑的震波显影非常近似，可能会被误判。媒体常报导，某地震等同多少颗广岛原子弹爆炸，是有几分道理的。对于这种疑惑，克拉克说：“如果我们预期某一类的事件 Y 会发生，而属于这类的 y 个案发生了，我们便会判断它是一个‘表意爆发’……。如果一连串的‘无意义爆发’出现，便会改变我们的预期，而从事另外一种符号类型 X 的猜测。”³⁵克拉克举的例子是闪电后，没有出现打雷，这现象违反了常识性的逻辑推理，亦即：闪电后会打雷。2004年12月26日大地震后，专家预言会出现后续强震和海啸。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余震和新的强震，但没能引发海啸。

“表意爆发”与“无意义爆发”的区分，非同小可；因为如果“爆发”的是灾难，它可以涉及到生死问题。海啸过后出现下面这个报导。在泰国南边海滩上的人看到下面的景象：（1）先前高涨的海潮退却了，露出了地面，（2）地面上留下搁浅的鱼。姑且不论到底这景象是自然符号还是“原符”，这两个“爆发”的现象在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上，都是紧接着的。这两个“原符”固然缺乏传播“意图”，却发出了讯息。但是人怎么解释它？利用哪一种符解去解释它？怎么解释它？却会造成天壤之别。实际上，根据目睹者（幸存者）事后的追述，当时显然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解释，导致了解释者截然不同的后果。解释之一裸露在沙滩上的鱼，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解释者的后续动作便是去捡鱼，当然就因此送了命；他们临死之前没有想到，接着上面所述的景象（1）和景象（2）的爆发后，还会有一个景象(3)大海啸灾难，也就是第三个“表意爆发”接踵而来。另外一批人，经验更丰富，也就是拥有了更健全的符解，对景象（1）和景象（2）作了正确的判断，跑到高处，保住了性命。这两种解释有什么差异？我们绝对不能说它们和无关痛痒的文学诠释的差异一样，因为这是要命的事儿！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差异之一：第二群符号解释者，也就是存活着，未

³⁴ 威廉·J·布洛德，〈寻找核爆，却找到地震！〉《纽约时报》及《国际先锋论坛报》，2005年1月19日 (William J. Broad, “Looking for Nuclear Tests, Finding Earthquakes”, *The New York Times an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9, 2005.)。

³⁵ 克拉克，《符号学原理》，页61。

曾把前面两次事件的爆发，就其表面价值解释，而把它们当作另外一个，尚未发生的“表意爆发”的“指涉场合”，或用普尔斯的话来说，指向另一意符的指示符号。

上述这个捡鱼或逃跑的例子告诉我们，灾难爆发绝非孤立事件，而系因果连锁反应。更重要的讯息是：自然灾害固然是正牌的自然符号，但是我们必须就其对人类的影响而评估。灾难学者莫罕默德·多尔和大卫·埃特肯重新界定这个现象

“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否？应当综合以下的因素决定：地震或风暴等事件泄露了社会的弱点，对社会酿成的灾害超出了该社会不靠救援就没有复原的能力”³⁶ 走笔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灾难”(disaster)和“灾害”(risk)是两回事儿。

“社会的弱点”和“复原的能力”以人为定位，这些术语无疑重申了裴凌前面所说的，自然事件如何能被翻译为危险和潜在性的灾害，需要取决于人类如何面对自然事件的冲击，以及无法承担这种自然现象冲击时的无力感。因此，灾难论述不可避免的包含了符号解码后的行动方案。从符号学的观点看来，其过程包括了符号系统的转换，如从自然系统转变为社会系统，并且——也许是更重要的——激发社会实践。根据埃特肯的规划，灾难的行动实践具有以下各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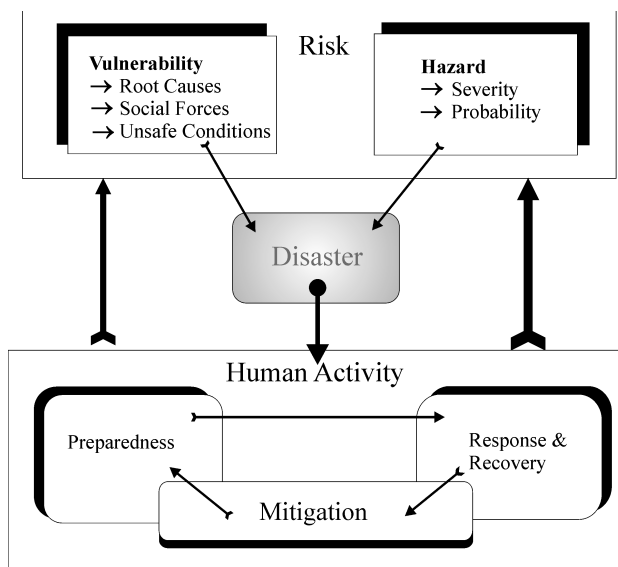
(1) 对灾难的应变及复原，(2) 灾害的救济，以及(3) 未雨绸缪式的预防。

“这一些行动会改善社会的弱点，并改变未来灾难的结构，以减低灾难可能造成的损害。”³⁷ 这三个步骤相互重迭，构成一个“灾难适应循环”，原图转录如下。³⁸ 笔者

³⁶ 莫罕默德·H·I·多尔，大卫·埃特肯，〈自然灾害：二十一世纪的适应能力与发展〉，收录于马克·裴凌主编，《自然灾害与全球化世界的发展》，页75（Mohammed H. I. Dore and David Etkin, “Natural Disasters, Adaptive Capac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Pelling [ed.], 2003, 75）。

³⁷ 大卫·埃特肯，〈灾害转移与相关趋势：如何因应更多的超级灾难〉，《环境灾难》，卷1，1999年，页69-75（David Etkin, “Risk Transference and Related Trends: Driving Forces towards More Mega-disasters”. *Environmental Hazards* 1 [1999]: 69-75）。引文见页69。

³⁸ 见上文，页70。



（附图“灾难适应循环”）

不善绘图，无法在扫描的原图上输入中译，此地只能简单地说明一下。图中央是灾难——其实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引起灾难的有右上角的灾变因素，如台湾嘉义部分地区处在断层带上、台湾夏季台风发生机率高，以及左上角的种种社会弱点（英语称为“受伤害性”），诸如偏远地区交通不便，救援困难，或居民迷信怪力乱神，求神驱鬼，拒绝医疗，不愿搬迁等。中央的灾难引发了人的行动如往下的箭头所示，包括应变及复原、救济，和预防等措施。这些因应措施又作为面对未来灾难的储备，以期减少灾害，其动线以由下往上的箭头表示。

如图所示，自然灾害和人的互动关系是系统性的。这正是作为系统科学的符号学所应当关注的。灾难符号学应当厘清，并尽可能地充分说明，自然和社会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何被建码及解码。此处随便举几个例子。如：（1）灾难如何变成灾害？（2）区分灾难的科学论述与灾难灭绝论、泛灵论、“天人合一”等民间智慧或泛哲学思想的文本化过程；（3）指出这些深入人心的文本与现代救援哲学文本的杆格难入与可能的、但真实的陷阱；（4）上述第3点其实便是“符解”正确与否的问题；正确的符解可改变受灾社会日后的“受伤害性”及

未来灾难的结构。回到十八世纪里斯本地震的伟大故事：卢梭与伏尔泰对地震的反应，引起的岂止是两人茶壶里的笔战？

2004年南亚海啸、2008年汶川地震——这两个最近的例子显示，今天没有一个灾难不是全球性的。这使我们回到全球性符号学的疑问。为什么全球社会愈来愈重视灾难？除了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外，答案存在于上图所显示的动态流程里。社会的弱点（受伤害性）和灾害的救援，不再是地区局部性的，而牵涉到全球动员的救援、捐助、危险分担，没有人能预料，未来的灾难会大到何等规模而可以置身事外。³⁹ 预测的机率和实际损害的分担，其中有太大的落差。布朗修曾经戏言：灾难书写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大灾难来临时，书写已经不存在了，符号演义也嘎然而止。

³⁹ 肯尼斯·修伊特，《灾害地区：天灾的地理导读》，哈尔楼，朗曼出版社，1997年（Kenneth Hewitt, *Regions of Risk: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Disasters*. Harlow: Longman 1997.）。